



100年前,党的第一个组织在上海成立

徐光寿 刘严宁

1920年2月19日,农历除夕。傍晚时分,上海十六铺码头一艘天津至上海的客轮上走下一位头戴绅士帽、行色匆匆的中年男子。在向北京发一封平安电报后迅速住进公共租界汉口路50号惠中旅舍,进了房间蒙头大睡。他就是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

陈独秀此次从北京赶回上海,与其说“赶”,不如说“逃”,一路上寒冷与惊险相伴,“此一行如鱼入大海、鸟上云霄,不受笼网之羁绊也”。但他心怀着一个伟大的目标和神圣的约定,准备在上海大展宏图。

今天,回望1920年至1921年的建党历程,脉络更为清晰,初心更为可贵!

党的第一个组织何时在上海成立?

陈独秀历来敢做敢为,敢做敢当。在惠中旅舍和东亚图书馆养病数日后,2月27日起他就投身政治活动——出席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开始践行他在京津途中与李达约的神圣使命——发动劳工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新式政党。经历过北京五四学生运动,他发现“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至足大憾者也”。“六大罢工”让他看到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

在上海,陈独秀从他最熟悉的教育和宣传做起,行程密集。2月29日,他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请演讲教育问题;3月2日,应邀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主张在开展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3月31日,孙中山宴请陈独秀,国民党多名要员作陪;4月16日与18日,应邀先后出席中华工业协会等工会组织的会议,即演讲上海工界现状,强调注重工人义务教育。5月1日,《新青年》推出《劳动节纪念号》,标志着陈独秀的建党工作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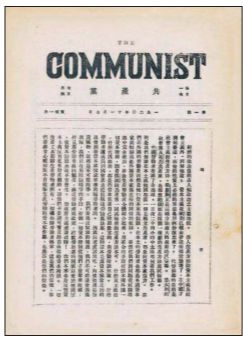
大约4月下旬,陈独秀接受同乡老友柏文蔚之邀入住其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的私宅,这是一幢建于1911年的两层砖木结构的旧式石库门民宅,面积约168平方米。坐镇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会见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联络上海社会主义者、接待来沪寻求真理的革命青年,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党的上海早期组织……

那么,党的第一个组织究竟何时在上海成立的呢?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委员会1987年推出的《共产主义小组(上)》记载: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即陈独秀寓所)成立。同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也认为:1920年8月,在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中心的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成为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

据《中国共产党上海史》记载,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环龙路老渔阳里(后改称格德里)2号陈独秀寓



修葺一新的上海市南昌路100弄2号(原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大门。



1920年11月7日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创办。



▲建党时期的陈独秀。



▲整修前的上海市南昌路100弄2号大门。(本版照片由作者提供)

所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具体日期虽无法查考,但可以确定在6月20日之前。

据《俞秀松日记》证实,参加会议的5人之一施存统是6月19日“这天晚上乘船赴日本”的,与施存统所说的6月19日晚间启程赴日本之说一致。据施存统本人回忆,1920年6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李大钊等也参加了。当时,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主张成立共产党。虽然施存统误读了维经斯基身份,也没说出具体时间,但能明确是“社会主义”,选举陈独秀为领导人(书记),而且会议起草的党纲草案10条内容中,已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目的等内容,已经具有共产主义的性质。8月,陈独秀在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后,正式将组织定名为“共产党”,不再称“社会共产党”或“社会党”,从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党的上海早期组织正式成立。

党的上海早期组织是如何为建党做准备的?

党的上海早期组织最初并不起眼,成员从5位发展到20多位,却开创了党的历史上多个“第一”: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创办了第一份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发布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宣言》,建立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开办了第一所工人学校——劳工半日学校,组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举办了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成立了第一个党的出版机构,领导了第一次工人罢工——上海烟草公司工人罢工,等等。这些“第一”,显示出中国革命的面貌开始焕然一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上海早期组织建党工作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是首次出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

本。1920年8月党的上海早期组织正式成立之际,由陈望道翻译,党的上海早期组织成员陈独秀、李汉俊审校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次出版,且一版再版,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党的上海早期组织公开亮出了“共产党”旗帜。1920年11月7日,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3周年之际,党的上海早期组织创办了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陈独秀撰写的《共产党》月刊短言宣告要“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即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共产党》月刊第一号还发表了《俄国共产党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共产党同他的组织》和《俄国共产党的历史》等文章,“共产党”旗号鲜明,正如毛泽东所说“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1920年11月23日,陈独秀在上海主持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分为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和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三部分,是全国建党的纲领性文件。

党的上海早期组织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在组建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指导工人运动方面发挥了“中心组”“中央局”和“发起组”的作用。时任共产国际在华工作全权代表的利金曾向其上级汇报说:“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共产主义小组,与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有组织上的联系,上海小组被认为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中央局。”

为什么还不能说明党已正式诞生?

然而,无论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理论要求,还是从党的上海早期组织的具体情况看,党的上海早期组织都存在一些缺陷,尚不能称之为无产阶级政党,它的出现尚不能等同于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立。

当时党员思想和成分较为复杂,夹杂着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维经斯基初来乍到急于求成,以致在中国很多地区“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把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拉进党的早期组织。俞秀松曾指出:“社会共

产党”中,既有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还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陈独秀也多次将“社会党”和“吾党”交替使用。思想难以区分,成分鱼龙混杂,经过多次论战才逐步划清了思想界限,一批非马克思主义者才退出了党的队伍。

1920年8月党的上海早期组织成立伊始,尚无正式、完整的政治纲领,不具备一个现代政党的基本要求。虽然它已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创刊号所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具有建党的纲领性文件的性质,也提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目标,但是,这个政治目标还很笼统,并没有制定正式、完整的党的纲领,更没有制定党的章程。纲领和章程是现代政党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一股要素和基本特征,不可或缺。

从组织领导机构看,早期组织也不具备一个现代政党的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最初只有5个发起人,仅有书记陈独秀一个人在负责,陈独秀离沪后是李汉俊代理书记,李汉俊之后是李达代理书记,始终是一人负责,一直没有组成党的组织领导机构,更没有组成现代政党所要求的领袖集团。

从党员规模和成分看,尚不具备一个现代政党所要求的工人党员凤毛麟角,以至陈独秀安排了青年俞秀松进入厚生铁厂从事工业劳动,发动工人群众,开展工人运动。

早期组织地域性质也较为明显,团体色彩较为浓厚。这是个不太受到学术界关注的因素。由于党员主要限于迁居上海和路过上海的外省籍积极分子,未能辐射全国形成全国性影响。在全国范围以及旅法、旅日学生中,还有7个党的组织先后成立。因此,党的上海早期组织只能被视为一个上海地方色彩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团体。

总之,不能把1920年8月党的上海早期组织的成立等同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但是,在党

的上海早期组织的召集和组织下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则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党的“一大”才是党的正式成立大会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来到上海,并与党的上海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在党的上海早期组织的召集和组织下,1921年7月23日,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平街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

据《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党的一大会议日程表是:7月23日晚开幕,并举行第一次会议,具体商谈了大会的任务和议程;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汇报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7月25日、26日,大会休会两日,用于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工作计划;7月27日、28日、29日三天,连续举行第三、四、五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7月30日,第六次会议开到晚间时遭到法租界侦探冲击而被迫中止。7月31日(或8月1日、3日),根据浙江嘉兴籍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大会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进行,讨论和通过草案,选举执行机关,完成了最后的议程,标志着党的一大闭幕。

老渔阳里2号的历史地位不可低估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这是上海的骄傲。他还指出: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近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作为近百年党史的起点,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法租界望平街106号,这两座石库门房子都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中国革命的发源地。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前夕,中共上海市委不仅推出了“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加大红色资源发掘保护力度,加快推进包括党的第一个组织成立地老渔阳里2号在内的第一批重要革命遗址的保护修缮和展陈更新,而且在去年9月和今年4月两度邀请党史学者为市委中心组作党史专题辅导报告,以加强党史教育、知识爱国教育。

如今的南昌路100弄2号,昔日的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是党的第一个组织成立地、中共中央第一个机关驻地,也是陈独秀、李达、陈望道等党的创始人工作和生活的地点,还是《新青年》《共产党》和《上海伙友》等革命报刊的编辑部。在上海较为集中的红色遗址区域,党的第一个组织成立地无疑是极为耀眼的历史印记,最能体现昔日老渔阳里2号的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

怀揣初心使命,历经百年风雨,中国共产党从这里出发,从团体到政党,从地方到全国,从小到多,由弱到强,经过百年奋斗和砥砺前行,如今已成为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正领导着拥有14亿人口的东方文明古国,朝着建成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接续奋斗。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100周年纪念专题



解 秋 日 报 消费 市场 专版

刊登内容

- 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
-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

电话: 021-22898598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王钦若去世后,次相王曾升为首相,史称他“方严持重,每进见,言利害事,审而中理,多所荐拔,尤恶侥幸”。“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请谒,(王)曾多所裁抑”;与王曾升首相同一日,枢密副使张知白拜相,成为次相,天圣六年(1028年)二月,卒于任上,史称他“在相位,慎名器,无毫发私。常以盛满为戒,虽显贵,其清约如寒士”。

张知白既卒,朝廷商议接替次相的人选,首相王曾推荐吕夷简,枢密使曹利用推荐张士逊,刘太后认为张士逊的席位居吕夷简之上,想用士逊,王曾说:“辅相当择才,不当问位。”坚持擢用吕夷简。这时,吕夷简站出来:“士逊事上于寿春府最旧,且有纯懿之德,请先用之。”刘太后嘉奖吕夷简“能”,遂拜枢密副使张士逊为次相。次年,即天圣七年(1029年),张士逊受曹利用案牵连而罢相,王曾又力荐吕夷简,刘太后不置可否,王曾说:“太后不相夷简,以臣度圣意,不欲其班(位)(在)枢密使张曾上尔。曹一赤脚健儿,岂容妨贤至此!”刘太后辩解:“吾无此意,行用之矣。”于是,“卒相夷简,以代士逊”。

《宋史》对王曾、张知白评价非常高:“论曰:李迪、王曾、张知白、杜衍,皆贤相也。四人风烈,往往相似。”吕夷简掌国柄最久,毁誉参半,亦未入仁宗朝“四大贤相”之列,但史笔仍得承认,“自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后配食仁宗庙,为世名相”。

在刘太后垂帘期间,朝廷还涌现了

多位敢于犯颜直言的台谏官,除了那位力阻钱惟演“因人相”的监察御史鞠咏,又有:右司谏刘随,因“临事明锐敢行”,人称“水晶灯笼”;殿中侍御史曹修古,“立朝慷慨有风节,当太后临朝,权幸用事,人人顾望畏忌,而修古遇事辄言,无所回挠”;右谏议大夫孔道辅,“性刚挺特达,遇事弹劾无所避,出入风采肃然,及再执宪,权益忌之”。

刘太后听政之初,中国的益州(今四川成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官交子。

益州使用交子由来已久,但最早的交子,严格来说还不是纸币,只是民间交子铺发行的票据,类似于存单或者兑换券。市民在交子铺存入现钱,即可换成交子,交子的面额是临时手写的;而持有交子的商民,既可随时往交子铺兑换成现钱(交子铺会收取3%的手续费),也可直接将交子用于交易支付。这就是私交子。

私交子发行十多年,便爆发了信用危机,因为交子铺收了商民存款,“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当商民持交子兑换现钱时,交子铺因现金流不足,“关闭门户不出”,商民兑换不到现钱,遂“聚众争闹”。

益州官方不得不介入调解。那么,交子当存还是当废?官方出现了两种意见:有人主张,不如干脆禁止交子流通,关闭交子铺;另有人则认为,“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如今问题不在交子本身,而是在交子铺上。若政府发行官交子,便可解决交子信用问题。此时,刘太后刚刚垂帘听政,她采纳后者的建议,于天圣元年十一月“诏从其请,始置益州交子务”,并于次年发行第一屆官交子,共发行“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

官交子有印刷的固定面额,分别是一贯文至十贯文,形式上更接近货币;而且,官交子具有法偿地位,性质上也更接近货币。我们说,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指的乃是官交子,而非私交子。

在刘太后垂帘听政的漫长岁月里,天圣七年(1029年)是比较重要的一年,是乾兴元年之后又一个不太平静的年份。

这一年六月,京师大雷雨,宋真宗生前倾力兴建的玉清昭应宫遭受雷击,引发火灾,“官凡三千六百一十楹”,烧得只有“一二小殿存尔”;同月,河北发生大水,“坏澶州浮桥”;十一月初一,出现日食,冬

十月,京师地震。参知政事鲁宗道在这一年二月去世,次相张士逊与首相王曾先后罢相,枢密使曹利用更是突然落马。

曹利用是两朝元老,当初宋王朝与辽国议和时,前往辽营谈判的特使便是曹利用,“澶渊之盟”的签订,有曹利用的一份功劳。自天禧二年(1018年)六月知枢密院事,至天圣七年正月罢职,曹利用在枢密院供职达10年之久,真仁之交的执政大臣,从寇准、李迪到丁谓、钱惟演,来来去去,只有曹利用稳坐枢密院。可以说,丁谓倒台后,曹利用便是朝中最有权势的元老,位在次相之上,敢与首相争班位,连刘太后对他都颇为忌憚,平日敬称他“侍中”,而不敢直呼其名。

随着权位日隆,曹利用也变得飞扬跋扈。内侍罗崇勋犯有过错,太后让曹利用前往训诫,你道曹利用怎么训诫,他脱去罗崇勋的冠帽,“诃斥良久”,污言秽语羞辱了大半天,罗崇勋因此恨在心里。

宰执大臣陪奉仁宗在御花园钓鱼。按惯例,皇上未钓到鱼,侍臣的鱼竿即使有鱼儿咬钩,也不敢先起竿,等皇上上钩上鱼,左右用红丝网承之,侍臣才能起竿,这是一种尊君的礼节。曹利用也想自己第一个钓到鱼,有欲起竿者,他的随从就上前制止:“侍中未得鱼,学士等未可举也。”曹利用钓到鱼后,同列才可以起竿。目睹这一切的一位馆阁校勘悄悄跟人说:“曹公权位如此,不以逼近自嫌而安于儗礼,其能久乎!”

曹利用甚至对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也有僭礼之举。垂帘日,他在帘前奏事时,有时“以指爪击带鞶”,即用手指敲打自己的腰带,这是不尊重太后的表现。左右指给太后看,说:“利用在先帝时,何敢尔耶!”太后看了,默默记在心里。